杨开慧的哥哥求安排工作，毛泽东都“没开口子”

“不要来北京”——这是毛泽东进京后，对求安排工作的亲朋故交用得最多的回复

时空走廊

关山远

近读《毛泽东年谱(1949-1976)》，读到一个有趣之处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毛泽东的亲戚、同学、故交纷纷给他写信，要求进京安排工作。毛泽东是怎么回复的？

《毛泽东年谱》如实还原了当时情形。颇有趣味，又发人沉思。

一、“不要来北京”

1950年5月7日、8日，毛泽东连续两天共回复了32封信，正好每天16封。12日，又回复了11封信。信中出现最多的文字是：“不要来北京。”

《毛泽东年谱(1949-1976)》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，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，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，同时又使用了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，内容非常丰富。根据统计，《毛泽东年谱》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收录了毛泽东回复亲朋好友的信件大约有170封。从复信内容来看，请求毛泽东解决工作问题与经济困难的占了多数。

按照传统观念，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打下了江山，亲朋好友怎么也要沾沾光。他们认为：帮忙到北京给安排个工作，对毛泽东而言，小事一桩。于是纷纷写信！

毛泽东一一回信，言语谦逊，态度坚定：

复信文凯：“来信收读。先生工作问题，似宜就近设法解决。”文凯是毛泽东表兄。

复信邓冰：“先生工作岗位，似以在原地为适宜，不必远游，未知以为然否？”邓冰是毛泽东故交，当时在广东一家中学教书。

复信凌汉秋：“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，甚为感谢。工作问题，请在当地设法解决，不要来北京，因京中人浮于事，不易解决。”凌汉秋，曾参加过辛亥革命，1925年与毛泽东结识，写信的时候在湖南株洲。

复信周振岳：“去年十月九日来信收到，甚慰。参加工作事尚望就近解决。”周振岳1925年曾受郭亮所派护送毛泽东由长沙去广州。郭亮是毛泽东挚友，著名工人运动领袖，牺牲前曾任湖南省、湖北省委书记。

复信李鑫：“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。工作问题，应在当地设法解决，不要来北京。”李鑫早年曾和毛泽东共过事，当时在江苏吴县务农。

复信陈国生：“来信收到，甚慰。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，不要来北京。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。”陈国生是毛泽东堂妹毛泽建的过继女儿。

复信毛贻华：“三月九日来信收到。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，我现在难于为助，尚祈鉴谅。”毛贻华是毛泽东的房叔。

复信王云晓：“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，有志上进极好。工作问题希望就近设法解决。”

复信张一权：“惠书敬悉，感谢你的好意。北京人浮于事，兄来不一定有好处，学习和工作，可就当地谋之，以为然否？”

复信王一凡：“元旦来信收到，感谢你的好意。工作事以就近设法解决为好。”王云晓、张一权、王一凡，均是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。

……

在给毛泽东写信的人中，毛煦生比较“执着”。他是湖南平江人，跟毛泽东没有亲戚关系，属于“一起扛过枪”的战友：辛亥革命爆发后，毛泽东曾经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当过兵，当时毛煦生是新军辎重营文书。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，毛煦生在一个半月里，连发3信抵京，强烈要求到北京工作。毛泽东于1949年11月15日回信道：“前后三函奉悉，迟复为歉。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，不要来京。家计国难，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。”

毛煦生继续写信，还是要求进京工作。1950年5月12日，毛泽东再次复信：

“来信收到。北京人浮于事，先生不宜远游，仍以在乡下工作为适宜。”

二、复信读出两大特点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，毛泽东回复给亲朋好友的信，信息量极其丰富，能够读出两大特点：

其一，按规则办事，走正常程序，不搞特殊化。

在传统思维中，改朝换代，机会多多，毛泽东的亲朋好友中，务农的想进城，没有工作的想找工作，已有工作的想换个更好的工作，在地方工作的想进首都工作……毛泽东一律婉言拒绝。譬如，他的同乡张四维，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，给毛泽东写信时，就职于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。毛泽东回复说：“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。吾兄已在盐业公司获得职业，甚好，应就此项工作努力，取得成绩与信任，不要来北京。北京人浮于事，不好安置。前已复一信，未知收到否？”

毛泽东在复信中解释，他不宜出面介绍工作，推崇“有为才有位”：“运昌兄的工作，不宜由我推荐，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，取得信任，便有机会参加工作。”“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，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，为人所重，自然而然参加进去，不宜由弟推荐。”……

对于其他求助者，尤其是烈士亲属要求落实烈属待遇的，毛泽东复信表示慰问之外，也强调要按统一要求办理。他在给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复信中写道：“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，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，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，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，光荣殉难。以上这些，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。惟抚恤一事，须统一行之，不能只顾少数，如省委未能即办，先生亦宜予以体谅。”他给革命烈士王基永的妻子龙亦飞复信中说：“去年十月来信收到。王基永同志殉难，极为痛惜。兹幸遗孤成立，业已就学，为之喜慰。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，未便某处独异，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。”

其二，言辞恳切，语气谦逊，从无居高临下之态。

他常常尊称对方为“兄”，自称“弟”，信中颇多“尚乞谅之”“尚祈鉴谅”“愚见如此，尚祈斟酌”之语。因求助信多来自湖南，他偶尔转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时，虽是下属，亦是商量口气。

周文楠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妻子，毛泽覃牺牲后，周文楠1942年在延安又成了家，她的母亲周陈轩一直在韶山生活，孤苦无依，1950年4月写信向女儿诉苦。时任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的周文楠遂给毛泽东写信，并将母亲的信转交给毛泽东。毛泽东看完信，心里难过，同意周文楠接母亲到东北生活。那时法官一贫如洗，周文楠根本没钱到韶山接母亲。毛泽东又给王首道写信：

> “亲情、友情、乡情，“情关”难过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进城“赶考”的难题之一。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，不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

“毛泽覃同志的岳母周老太太年已六十，住在湘潭韶山我的家里已有十余年，同当地人民的关系甚好，是一个好老人。她的女儿周文楠同志在沈阳法院工作，现回家去看老太太。老太太前有去东北依其女儿之意，但尚未作决定。如老太太去东北，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给以旅费的帮助。如可能，在通例上说得过去的话，则帮助之，如不可能，则要她仍住现地不动，请与文楠同志商酌办理。”

湖南省研究：老太太是烈士家属，同意旅费帮助。周文楠这才有条件回到了韶山，与睽违10多年的母亲见面，并将母亲接到了东北。

三、裙带之门不可开

1927年秋天，长沙，毛泽东与杨开慧和三个孩子挥手作别，这是这对夫妻相见的最后一面。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，杨开慧是毛泽东追念不已的一生最爱。

开国大典前夕，毛泽东收到了杨开慧哥哥杨开智的信，他喜出望外，回信：“杨开智先生：来函已悉。老夫人健在，甚慰，敬致祝贺。岸英岸青均在北平。岸青尚在学习。岸英或可回湘工作，他很想看外祖母。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，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，你们不必悲痛。我身体甚好，告老夫人勿念。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，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，有便望告。此复。敬颂大安。毛泽东”

杨开智回信：希望到北京工作。但毛泽东回信拒绝了。

杨开智早在少年时代就跟毛泽东熟悉了。他对北京也不陌生，1918年，杨开智、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，举家迁居北京。当时毛泽东正好也在北京，常相会杨家，热烈讨论中国之未来，杨开智深受影响。1920年杨昌济病逝，他扶柩回湘。1921年，他考取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(今天的中国农业大学)，成为当年少有的大学生，他参与创建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社会主义研究小组，并任组长。

毛泽东是非常感谢杨开智的：他尽个人财力支持毛泽东开办文化书社，一直掩护帮助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革命工作。杨开慧惨遭杀害时，毛岸英只有八岁、毛岸青七岁、毛岸龙三岁。敌人故意把三个孩子放了，想以此当诱饵抓捕毛泽东。杨开智和妻子李崇德冒着杀头的危险，从监狱接回毛岸英三兄弟，在特务监视下，东躲西藏，担惊受怕。后来根据党的指示，又让60多岁的杨老太太和20多岁的李崇德舅妈扮着走亲戚的样子，冒险将三个孩子转移，坐火车前往武汉，而后改乘轮船到达上海，护送到上海地下党组织，交给他们的叔父毛泽民。

杨开智唯一的女儿杨展，1937年12月在长沙入党，1938年8月到达延安，1941年秋天在晋察冀边区英勇牺牲。

有学历，又是烈属，杨开智完全符合到北京工作的条件，但谁让他是毛泽东的亲戚呢？裙带之门，不可开。

1949年10月9日，毛泽东给杨开智回信：“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，不要有任何奢望，不要来京。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，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，不要使政府为难。”

同时，毛泽东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：“杨开智等不要来京，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，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。其老母如有困难，可给若干帮助。”

杨开智一直在湖南工作，以自己的专长，为湖南的茶叶事业做出贡献，他曾兼任安化茶场的解放后第一任场长，安化，就是今天著名的湖南黑茶产地。因年老体弱离职休养后，仍然积极从事社会活动，同时编写资料，撰写回忆录，向青少年一代宣传革命事迹，传承红色基因。

史载：晚年杨开智为人谦恭，生活俭朴。

四、“无情”中的“有情”

毛泽东绝非无情。

1950年7月19日，毛泽东给从未谋面的吴启瑞写了一封信：

启瑞先生：

五月来信收到，困难情形，甚为系念。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，减轻你的困难一事，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，看是否可行。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，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。我是没有不赞成的，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？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，望加保重，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。

此复，并颂

教祺

毛泽东

吴启瑞当时任江苏无锡师范附小低年级教员，她的亡夫王人路是湖南浏阳人，王人路的父亲王立庵，曾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的数学老师。毛泽东当时的数学成绩很差，对学数学也不感兴趣，王立庵耐心施教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：“立庵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，是我的老师。在立庵先生的教育下，我是受益匪浅啊！当时我喜欢读古文，而不爱数学，但立庵先生并不因此歧视我。”

毛泽东帮助吴启瑞，不仅仅因为她是王立庵的儿媳，而是因为她实在太困难了，一个单身母亲，带着八个孩子。毛泽东的复信，对这位艰难挣扎的母亲来说，是雪中送炭。

毛泽东一直强调“实事求是”，当时中国百废待兴，大量工人失业，许多群众生活困难。亲朋好友求助的，实在困难，他想办法给予帮助，但想换个好工作的，他细致做思想工作，譬如，1950年5月18日，他在给毛泽覃妻子周文楠的侄子周起鹗复信时写道：“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，虽不适意，犹胜于失业者，尚希安心从事，然后徐图改进。”

禁止裙带关系，但有时也举贤不避亲，标准是：是否有益于党和国家。1950年8月6日，毛泽东致信王首道，让他安排给王季范买票来京。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，毛称其为“九哥”，但他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提出“用贤才、立法制、崇道德”的治国方略，供毛泽东参考。王季范进京后，历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，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为党和国家做出重要贡献。

在《毛泽东年谱》中，记载了1950年5月24日的一件事：“阅章士钊关于荐用李傥的来信和李傥的自传，批示：请周酌办。章士钊只荐此一人，似宜用之。’又在李傥自传上批示：李自谓已六十六岁，有妻室之累，无儿可靠，觉悟前非，力图晚盖，精力尚能做事，希望给予一工作。’”李傥与毛泽东并不相识，他是长沙人，曾留学日本、德国，担任过国民党财政部次长，为官清廉，后参加程潜组织的湖南和平起义。毛泽东批示后，李傥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，1954年，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，移居武汉，步行上班，经常只身草鞋去各地考察经济工作。

最令人动容的，是毛泽东对张千的关心。张千任湖南一师校长时，因学杂费问题，毛泽东起草《驱张宣言》，要赶走张千。张千恼怒之下，则要开除毛泽东。幸而杨昌济、徐特立等教师力保，毛泽东未被开除。1950年10月11日，在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岁月中，毛泽东还专门给王首道写了一封信，让他关照贫病交加的张千：“现闻先生家口甚多，生活极苦，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，借资养老……”

毛泽东甚至特地嘱咐王首道：张千的家，在长沙妙高峰中学。

五、“情关”如何过

亲情、友情、乡情，“情关”难过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进城“赶考”的难题之一。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回答。

毛泽东的外祖父家在湖南湘乡唐家坨文家，小时候，他在文家有诸多难忘时光，亲友情感甚笃。1950年代，毛泽东收到表侄文炳璋的一封信，汇报了文家有人“不大服政府管理”的情况，毛泽东高度重视。1954年4月29日，他专门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：

“文家任何人，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，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，勤耕守法，不应特殊。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，觉得不好放手管理。我的态度是：第一，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，又是我的亲戚，我是爱他们的。第二，因为我爱他们，我就希望他们进步，勤耕守法，参加互助合作组织，完全和众人一样，不能有任何特殊。如有落后行为，应受批评，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。”“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坨的人们看，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”。

是的，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，不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。

怀人

战地记者与敢死队长半个世纪的君子之谊

郑学富

有这么一对朋友，他们互相仰慕，神交半个世纪。在烽火硝烟的岁月，一个是战地记者，一个是报道对象，可是由于戎马倥偬却无缘见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一个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，一个在大西北从事群众文化工作，两人互相通信，互致问候，交流工作，一直到双方病逝都未能谋面。他们就是当年《新华日报》记者陆诒和台儿庄战役敢死队队长王范堂。

战地报道连接起的情缘

1938年春，台儿庄战役正处在激战之时，《新华日报》记者陆诒冒着烽火硝烟来到台儿庄前线。4月7日，当中国军队刚刚完全收复台儿庄时，陆诒通过运河浮桥，踏进台儿庄城内。战后台儿庄，尸填街巷市野，血盈运河沟渠。百年古城，无墙不饮弹；鲁南大地，无土不沃血。陆诒对战后台儿庄描写道：“眼前是一幅断墙残垣的焦土景象！全城再也找不出一所完整的房子，脚下所触的尽是瓦砾、弹片、炮弹壳，半烧焦的木片以及电线之类的。从西门可以一眼看到任何一门的郊外，没有什么东西来阻挡视线。”陆诒在采访中，获知了57人敢死队夜袭日军的英勇故事，他在《新华日报》1938年4月8日刊登的台儿庄大捷电讯稿、4月13日、15日刊登的战地通讯《满怀兴奋上前线》和《鲁南会战》中三次对敢死队奋勇杀敌作了报道。后来陆诒在出版《战地萍踪》一书时，综合三次报道写道：“战斗最紧急的时候，日军已占领了台儿庄寨子的五分之四，甚至连寨子的西北角也被攻占。当时坚守台儿庄的我军和外边的交通线，全靠西门这条路。如果不及时夺回西北角这块阵地，我军在台儿庄势必被日军包围歼灭，局势千钧一发。4月1日晚上，池峰城师长当机立断，特选拔57人组成敢死队，连夜袭击日军阵地。经过激烈战斗，全部清除了插进西北角的日军，保证这条和外间联系的交通线。在这次夜袭肉搏战中，敢死队生还的只有一位副营长和十三名士兵。其他的官兵都壮烈牺牲了。这次夜袭的成功，奠定了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基础。”

13名生还者之一就是王范堂，时任第2集团军第27师158团3营7连连长。当时，因为王范堂一直在前线追歼敌人，陆诒并没有采访到王范堂，敢死队的英勇事迹是31师师长池峰城和守城旅长王冠五向陆诒讲述的。敢死队的事迹经《新华日报》报道后，成为当时轰动国内的重要新闻。从此，陆诒和王范堂互相知道了各自的名字，但是却无缘相见。

《忆台儿庄战役》勾起二人的共同记忆

在台儿庄战役中，王范堂因作战勇敢，被提升为营附(副营长)，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。以后，在抗日战场上转战南北。1948年冬，王范堂任国民党第30军第30师少将副师长。1949年春开往成都驻防。12月23日，王范堂与师长谢锡昌率全师官兵约7000人在成都通电起义，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，回到人民的怀抱。1950年12月，王范堂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学校军事教官，后转业回到老家石泉县，1955年调任汉中市文化馆副馆长，1976年退休。

1938年5月下旬，陆诒跟随部队突出重围，回到汉口，奔波在长江两岸抗日战场采访。后来，辗转到华北敌后战场，采访了朱德、彭德怀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贺龙、左权等八路军高级将领，撰写了大量的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战地通讯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陆诒担任上海

> 在烽火硝烟的岁月，一个是战地记者，一个是报道对象，可是由于戎马倥偬却无缘见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两人互相通信，互致问候，交流工作，一直到双方病逝都未能谋面

《新闻日报》编委兼采访部主任，1956年任《新闻日报》(后与《解放日报》合并)副总编辑，以后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常委、上海市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。陆诒热心参与新闻教育工作，培养了许多新闻从业人员，80高龄仍兼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。

1985年，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，陆诒写了一篇《忆台儿庄战役》的文章，发表在同年9月7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陆诒以亲身经历回忆了台儿庄战役经过，又一次提到了57人敢死队。王范堂看后深有感触，一篇文章勾起了二人的共同回忆。王范堂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《敢死队夜袭日军记》，被收入《徐州会战》一书中。

1986年9月28日，王范堂在汉中市文化馆提笔给陆诒写了一封信。在信中，王范堂谈到了陆诒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的文章，说：“你在这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五十七人敢死队的作用，读后深受感动，死者如有灵一定会含笑九泉，幸存者亦感到极光荣。这里我谨以五十七人的名义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。”落款为台儿庄战役敢死队队长王范堂。

这封信通过上海的《解放日报》转至陆诒，已经是11月份了。11月15日，陆诒给王范堂写了一封回信。在信中，陆诒回忆了他深入台儿庄前线采访，报道五十七人敢死队时的情景，再一次称赞敢死队，并由衷地向王范堂表示崇高的敬意。陆诒在信中向王范堂介绍了自己的近况后，说：“我真诚愿意同您做朋友，多多向您学习，希望您经常赐教！”陆诒还给王范堂寄去了自己新出的《战地萍踪》一书。

王范堂收到陆诒的信后，又于11月26日写了一封回信。在信中，他向陆诒表示感谢，介绍了自己的近况和家庭生活情况。说道：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，像你这样一位有名望、有身份的著名新闻家，能如此谦虚和诚挚的态度和我谈心并和我交朋友，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，才能成为现实。从你身上我感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质。”

战火中凝结而成的友谊在延续

陆诒和王范堂不断书信来往，情谊进一步加深。在信中，二人除了相互问候外，更多的是共同回忆当年战斗情景，交流探讨。1987年3月8日，王范堂又给陆诒写了第三封信。王范堂满怀深情地说：“你的大作《战地萍踪》，我反复阅读过几次，但总不能尽其意味，特别是当我读到书中有关卢沟桥地区防御战、娘子关保卫战、台儿庄会战、武汉外围保卫战等篇章时，我的心中仿佛随着作者的笔端，又回到了八年抗战那战火纷飞的年代。可以说，关于你的这本属于历史文献的作品，我不是在读而是在听、在想、在重新感受。……应该说，我们不仅仅是朋友，而且也是战友，是在抗日战争的同一战壕里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过的战友。为此，我真诚地希望，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共同奋斗中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。”王范堂还随信寄赠陆诒一张照片。

3月19日，陆诒给王范堂回信说：“大作《台儿庄会战中的五十七人敢死队》也拜读，深为敬佩！五十七人敢死队成员都是抗日英雄，没有您们的流血牺牲，我们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今天的祖国还不够富强，我们还要在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，艰苦奋斗，为振兴中华，统一祖国而继续努力！”陆诒也随信寄赠照片一张。

正当两位老人互相勉励，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携手奋进时，1987年5月9日，王范堂突发脑溢血，被病魔夺去生命，享年80岁。噩耗传来，陆诒万分悲痛，5月10日，他发去悼唁函，在唁函中，陆诒向王范堂的家属表达了悼念之情，再一次肯定了王范堂的抗战业绩。他说：“王范堂同志当年亲率敢死队员五十七名夜袭敌军阵地，为台儿庄胜利打下了基础，战功卓著，永垂千古。”唁函中还回忆了二人的交往和友谊。后来，陆诒还专门写了一篇悼念文章，发表在1987年7月18日的《团结报》上，赞扬和肯定了王范堂的历史功绩。

王范堂去世后，其长子王耀煊继续与陆诒多次书信来往。1988年，王耀煊作为参战将士的后代，前往山东台儿庄参加了台儿庄大战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，会后，专程奔赴上海，拜晤了陆诒。

1997年1月9日，陆诒病逝，享年86岁。《解放日报》社组成陆诒治丧小组，专门给在陕西省汉中市民革工作的王耀煊寄去讣告。王耀煊在千里之外发来唁电，对父亲的老朋友陆诒去世表达悼念之情。以后，两家的后人继承先辈的友谊，经常联系来往，延续这份在战火中凝结而成的纯洁高尚的情谊。